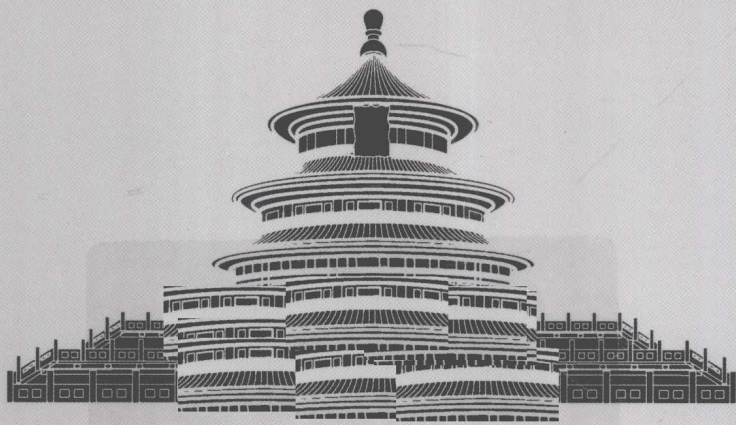


先锋★中国
XIANFENGZHONGGUO



中国崛起 靠什么

崛起是一个不断挨批和冒险的过程

中国崛起目前仍面临着三种可能的结果：

一种是像美国当年超越英国一样，成为世界领导国；第二种是像苏联一样，与美国达到同一等级之后衰败下来；第三种是像日本一样，在崛起的半路就衰落了。

阎学通 吴文兵◆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先锋★中国
XIANFENGZHONGGUO



中国崛起靠什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崛起靠什么 / 阎学通, 吴文兵编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438 - 6459 - 7

I. 中… II. ①阎…②吴… III. 发展战略 - 研
究 - 中国 IV. 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177 号

中国崛起靠什么

阎学通 吴文兵 编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喻 立

装 帧 设 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科地印务公司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7. 75

字 数: 213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459 - 7

定 价: 28. 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善抓机遇，方能崛起

（代序）

清末的仁人志士们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口号，冷战后这一口号被“中国崛起”所取代。进入21世纪之后，没有任何事件比中国崛起更能影响全世界。崛起为世界强国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期盼，但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为国家崛起创造的机遇却不同。回顾新中国崛起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崛起机遇是自己争取来的，而非上帝赐予的。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国人对于中国崛起的机遇问题有了新认识。决策者与普通民众都没有想到一场全球的经济灾难却使中国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崛起的速度大增。2009年中央领导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加强和改进外交运筹，正确把握机遇和挑战的辩证关系，善于从变化的形势中把握和运用机遇，善于在严峻的挑战中捕捉和运用机遇，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战略机遇期”的争论。

90年代初曾有无数论证我国面临“战略机遇期”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面临着没有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高速增长

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的时间长度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应加紧发展经济，否则以后就没机会了。然而，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所展示出来的现实却与这种观点完全相反。首先是这次世界经济的低增长比以往的高增长更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是，这次经济危机并没有缩短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迹象，反而显示出中国崛起将可能会有更多的机遇。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崛起就不断地有战略机遇，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源源不断的机遇。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我国靠相当于美国GDP5%的经济实力与美国进行了朝鲜战争。然而，这场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中国崛起带来了迅速繁荣昌盛的机遇。我儿时的亲身经验是，家里生活宽裕，社会和谐，从不担心有贼人入室。在“大跃进”时期，听到大人们议论的是十五年内超英赶美。

没想到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不但没有加快中国的崛起，反而是严重破坏了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削弱了国家的物质实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国家陷入社会动乱。外交上同时反美反苏。内外战略决策的失误破坏了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机遇。“民族复兴”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崛起创造了新机遇，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和社会只关注改善贫困，而忽视了国家崛起。直到90年代末，中国崛起仍被视为是乌托邦。1998年我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书中的“中国崛起”概念遭到许多批评。许多人认

为中国人均 GDP 位于世界 130 位之后，谈中国崛起无异于是新的“大跃进”。

有趣的是，就在国内同仁们批评中国崛起这一概念的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却不断升温。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一时间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热门话题。进入 21 世纪，俄罗斯学者率先称中国为“新兴超级大国”。从 2002 年起，中国每年有一两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超过日本。中国的外汇储备于 2006 年超过日本后，否定中国崛起的观点渐渐失声。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遽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年 G2（中美两国集团共治）的概念充斥了国内外媒体，认为中国崛起出现新机遇的观念成为世界主流看法。

回顾新中国 60 年的崛起进程，最重要的经验是利用机遇和创造机遇的问题。在 50 年代和 90 年代末以来，我国较为及时地抓住了战略机遇，较好地利用了战略机遇，而在其他时期我国则未能利用机遇，甚至是破坏了机遇。以往 60 年，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大国就能较好地利用机遇，有的大国则没能利用好机遇。历史表明，崛起更多依靠随时抓住机遇和创造机遇的战略能力。“战略机遇”是抓得住就不断有和抓不住就永远没有的客观环境。及时合理地调整战略，不但可以充分利用机遇，甚至可以化危为机，创造新机遇。2008 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所有国家都是危机，会利用者则化危为机，不会利用者则尽受其害。为给我国崛起创造不间断的机遇，我们有必要总结历史经验。

大国崛起要靠制度建设而不能靠政治运动。大国崛起是一个通过几十年综合国力持续增长才能实现的政治目标，因此需要不断地

完善制度来保障国力的持续增长，也就是保持长久的崛起机遇。政治运动有短期变革功能但缺乏长期保障能力。由于政治运动目标不同，上次运动取得的成果多数会被下次运动所抵消，使国家在崛起的道路上进三步退两步，停滞不前。

大国崛起需要不断的体制改革而非一次性彻底革命。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继承原有体制的合理方面改进不适宜的部分，后者则是全面否定原有体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体制的不适应是必然经常发生的，因此需要不断地改革不适应新情况的体制，给崛起创造新机遇。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是，体制改革领先的领域和地区发展速度快，改革滞后的领域和地区则发展速度慢。我国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的差别，沿海和内地的差别是典型的例子。

大国崛起需要国力要素平衡发展而非依靠单一实力的增强。保持国力要素平衡发展，是给每种国力要素创造同等增强的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具有全球性影响，政治实力具有地区性影响，军事实力基本上仍是本土防御水平。如不能做到国力要素平衡发展，我国则可能重复日本二战后富而不强的历史。这意味着大国崛起目标无法实现。

大国崛起要靠自我创新而非从外部引进。清末以来，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将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带回国，然而每批回国留学生的作用都只是暂时地缩小在某一领域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难以实现超越。中国要实现崛起，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创新”与“创造机遇”的含义有很多重叠之处。特别是制度创新，很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战略机遇。

现代的大国崛起需要普及现代高等教育而非普及贵族生活。日本的 GDP 在 1988—2008 年的 21 年中保持世界第二，人均 GDP 高于美国，但日本却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依据国际标准，目前中国的富人总数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在高等教育不普及情况下，我国难以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在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赶不上美国之前，富人总数赶上美国也难实现崛起这一目标。提高人的素质是提高创新能力的根本，因此也是提高创造机遇的能力。

目前，国际社会普遍预测，中国将于 20 年内崛起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强国。然而，中国将早于还是晚于这个时间赶上美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能否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遇。本书收集了我 2004 年以来的就中国崛起的环境、实力以及战略发表的一些看法。希望这些文章有益于读者们独立判断今后中国崛起的前景。

阎学通

清华园 2009 年夏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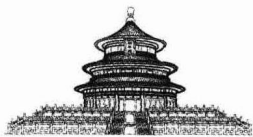
· 目 · 录 ·

第一篇 天下大势

- 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 (002)
- 中国的机遇 (010)
- 2020年，国际格局会怎样？ (018)
- 新战略环境下中美欧面临的挑战 (023)
- 黎以乱局反映国际政治本质 (027)
- “金砖四国”合作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033)
- 金融危机下中国如何思想 (039)
- 中美还不是朋友 (045)

第二篇 和平崛起

- 如何理解“和平崛起” (056)
- 中国全面崛起的群体担当 (062)
- 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 (067)
- 尊严无价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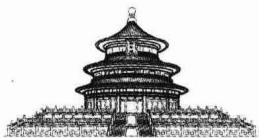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 目 · 录 ·

从奥运透视中国利益排序	(080)
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087)
中、印崛起和中国的国际作用	(090)
强大军力才能保证和平崛起	(095)
没敢想的崛起	(100)
“战略机遇期”失不再来吗	(105)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崛起	(110)

第三篇 实力为王

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	(118)
中国软实力有待提高	(146)
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	(151)
文化资源需要政治运用	(158)
“增强国家能力”是我国核心利益	(164)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 目 · 录 ·

第四篇 安全威胁

全球化下的东亚地区合作	(168)
东亚安全不取决于中日关系	(177)
安全利益是中国首要利益	(183)
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与和谐世界政策	(189)
朝核谜局猜想	(205)
2010 年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	(213)

第五篇 谋定乾坤

2006：“和谐世界”迈出第一步	(220)
中日关系如何推进	(223)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228)
中国崛起战略	(231)
中国外交追求平衡的和谐	(237)
上海峰会意味着什么	(239)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 目 · 录 ·

我们绝不能舍本逐末	(245)
做意志坚强的大国	(252)
跋	(260)
附注	(265)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天
—
下
—
大
—
勢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the Rise of China

中国崛起靠什么

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

2006年，笔者分析了美国“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并据此指出：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单纯依靠偶然的机遇，而更应努力去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不能坐等“第二块馅饼”掉下来。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当今世界，中国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我们要分析“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就需要明确这种变化的比较时间。“9·11”发生在2001年，因此我们需要比较2001年前后的不同。2001年以前是一个太长的时间概念，冷战、二战、一战都属于2001年以前。为此，我想把比较的时间控制在冷战结束后，即1991年苏联解体后。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比较1992—2000年的国际形势与2001年迄今的国际形势有什么不同。我想就国家行为体系性质、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国际主要矛盾、国际安全五个方面的变化做一点评论，最后再谈一点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首先，国际行为体系的变化。美国的霸权性质减弱，强权性质增强。依照中国先秦学者们对国家性质的分类，国家行为体只有三种，

即强权国、霸权国和王权国。强权国是以军事为手段进行扩张的国家，不遵守国际条约；霸权国也进行军事扩张，但它对盟友讲诚信，履行已签署的国际条约；王权国则是以军事手段维持国际规范，带头履行国际条约的国家。根据这种国家行为体的性质区别标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时是个霸权国，“9·11”后逐渐向强权国转变。霸权与强权的本质区别是：前者讲诚信，遵守已签署的国际规范；后者不讲诚信，不遵守国际规范。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军控条约和世贸规则方面是一个规则推动者。2001年布什上台后，特别是“9·11”后，美国逐渐成为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为了发展反导系统，美国单方面退出了ABM条约。为了牵制中国，美国违背NPT条约规定，与未签署NPT条约的印度进行核合作；为了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美国违背MT—CR规定，向日本出口导弹技术。最为突出的事例是美国不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2003年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国家性质由霸权向强权的变化，不仅受到其传统盟友的批评，而且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批评。布什之后的美国领导人是否能阻止或改变美国从霸权国转向强权国的趋势还难以判断，如果民主党上台，美国重新回到克林顿霸权道路上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违背国际规范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起到带头作用，使许多国家跟进，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违背国际规范。在美国向强权性质国家转变的同时，一些大国的性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国家正在从重经济向重军事方向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小泉2001年上台后，改变了二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吉田三原则”，将走经济大国道路改为建立政治大国的目标，修改和平宪法，恢复国家战争权，将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普京上台后，强调国防建设是重新恢复俄大国地位的基础，因此



鼓励军工发展，增加国防开支，加强国防科技投入，增强军事力量的建设。印度在“9·11”前就重视军事建设，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印度自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一直在加强核武器开发，同时还在加强常规军事力量的建设。200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政策。在大国中，没有明显强调国防力量建设的国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

“9·11”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变化的最突出一点是非政府组织的军事实力明显提高。近年来，无军事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绿色和平组织、人权组织等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有所上升。但是，这些非军事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上升速度远不如军事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在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削弱了塔利班的军事力量，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却提高了中东地区许多反美军事组织的力量。伊战前，伊拉克反政府组织的军事能力很低，而现在它们不但影响伊政治形势，而且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影响全球石油价格。在2006年的以黎（真主党）战争中，以色列正规军未能预期到战争的结果是它无力清除真主党武装力量。这充分表明中东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具有与国家正规军较量的能力。美国在伊拉克陷入的困境，说明非国家行为体的军事能力在增强。刚果的内战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军事冲突不断，表明没有国际武装力量能平息那里的军事冲突。近年来，学者们只关注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作用，而并没有预期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军事作用。这种意外也表明非国家行为体军事力量的增强。

其次，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在“9·11”之后没有发生性质变化。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多强中还没有任何一国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冷战结束时，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格

局将从两极格局转化为多极格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格局并未形成多极，“9·11”以来多极格局仍未出现。与冷战结束初期多极化趋势相比，今天的多极化仍只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一种可能趋势，而且这种趋势的可能性并未加大，多极化的速度也未加快，多极化的迹象也未增多。恰恰相反，在多极化作为一种国际格局变化可能存在的同时，出现了国际格局重新回归两极的可能。目前，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可能性并不比多极化的可能性大，但两极化的可能性则是 90 年代初所没有的。删除 15 到 20 年后，世界格局到底是两极还是多极，现在还无法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今后即使出现新的两极格局也将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不一样。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为基础的两极格局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国际规范的变化。“9·11”后国际形势变化较为突出的方面是国际规范的变化，特别是双重标准的规范正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大国采取双重标准的政策是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一般是大国一方面自己采取双重标准政策，另一方面批评他国采取双重标准。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9·11”后大国批评别国采取双重标准政策的现象减少，国际舆论对大国的双重标准政策批评也减少。继续批评大国双重标准政策的国家是少数国家，如朝鲜、委内瑞拉、伊朗、古巴等。例如，国际社会在防止朝鲜和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同时，默许了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权力。在阻止伊朗按 NPT 条约规定建立民用核设施的同时，美国与不签署 NPT 的印度进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而且没有大国采取反对立场。国际社会在防止导弹技术向美国的敌国扩散的同时，没有大国反对美国与盟友进行反导导弹技术合作。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始依据身份差别执行国际规范。即大国可以做的事，小国是不可以的；盟友可以做，敌手不可以做；而且国际社会开始用